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第二辑

“宏观调控如同开车，
为什么不选择微调方式，
让国民经济这辆车受损小，
每个乘车人舒服一些呢？”

微调论

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府政策



Studie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上海远东出版社

陈东琪 著

微 调 论

——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府政策

陈东琪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乔 健
封面设计 王月琴
责任出版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吴明泉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第二辑)

微调论

——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府政策

陈东琪 等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印张	9.75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千字	2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插页	4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7-80613-821-8 / F·304

定价: 16.00 元

前言

读者在阅读手头这本以《微调论》为题的书时,也许想了解作者究竟“想说什么”和“说了什么”。不过,在您读正文之前,我想借这个“前言”,简单描述一下我的微调思想的形成过程,对这一思想的基本要点和政策主张作一个提示。或许,这可以缩短读者翻阅这本书所花费的时间。在我们所处的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新世纪,任何人的时间都是极为宝贵的,时间是个人的最大财富。

1987年夏天,刘国光老师、张卓元老师和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怀柔县讨论“3·5·8改革思路”(当时,有8个单位参加,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还有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发中心、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两位老师要我执笔起草。后来,我们以“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为题,提出了被政府采纳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在这个思路中,我们最早提出了微调思想。这个思想的基本意思是指,中国经济要避免大起大落现象,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增长,除了加快市场化改革,在实现企业机制转换、建立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市场参数调节微观不平衡外,还需要在改革宏观调节机制的同时,改善宏观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政策指导的效果,其途径之一是减少人为的政策波动,树立微调观

念。我们讲的“稳中求进”中的“稳”，既有政府追求的“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之意；又强调政府政策操作要平缓一些，渐进一些，而不应采取要么是“急刹车”要么是“急踩油门”的方式，在时间上要打提前量。因此，政策操作的力度、强度和幅度不能太大。这是我们较早提到的微调思想。

1987年9月，我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的“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兼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一文，强调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要树立微调意识，用小调整代替大调整。1988年2月，我又在《经济研究》第2期“当前需求控制的主要目标——兼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微调的观点。198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政府干预的长期选择”中，我又从长期动态角度讨论了如何在政府干预中贯彻微调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微调思想，是在1990年底完稿的《强波经济论》一书中。这本书实际上是我的博士论文，是1987—1990年期间研究成果的概括。这本书，在建立“强波理论”时，比较细致地阐述了“微调”观点，并且明确提出了“双向微调”思想。后来，在一些论文和专著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这部研究生教科书中，我进一步阐发了微调思想。

回过头来看，我这10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是从“发展”、“体制”和“政策”的角度，一步一步地提出微调理论体系各部分的观点。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首先是对这些观点的综合。当然，这种综合是在加进了最新思想后的综合，是对经济发展最新趋势的概括性描述。

在近10多年来的政策理论研究中，我始终认为，一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不仅需要有一个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的市场调节机制，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企业预算约束软化

的制度,使全社会经济主体行为都受硬预算的约束,都接受单一的价格信号调节。但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怎样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政策工具组合模式的选择,以及政策操作的方式和技巧,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在政策操作方式和技巧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提供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近8年来,美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应当说,首先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采用微调的货币政策操作有关。90年代,美联储的调息次数多,幅度小,间隔短,频率高。这种小调整的主要目的是调预期,向上推动是渐进的,向下推动也是渐进的,不是等到问题累积得很严重时再来动大手术。这种微调操作,可以减缓经济系统的震荡。比如,1998年年中,美联储减息两次,每次只有0.25个百分点,当第一次减0.25个百分点时,市场没有什么反映,投资商嫌幅度太小,格林斯潘便很快又再减第二个0.25个百分点,结果,市场有明显的反映。由此可见,格林斯潘的小调整政策是很灵活的。

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显得还不够灵敏。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下调到4.77%,降幅超过50%,减6.21个百分点只用了5次,调整频率小,每一次幅度大,各次之间时间间隔长,所以,采用的是大调整。结果5次减息后没有很大效果,有学者因此怀疑货币政策失灵。实际上,政策操作方式和技巧上存在一些问题。如果用微调方式,实行小幅多次调整,比如将5次改为8次或10次,调整频率提高,单次调整幅度变小,各次间隔缩短,企业和居民对减息行为就会更为关注,就可以获得调整的预期效果。当然,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在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过程

中,我们的中央银行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在5次减息的26个月中,央行一只手减息,另一只手将货币供应的闸门越拧越紧。比如,在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这两次减息期间, M_0 的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年初计划15%,到6月末只有6.6%。等到发现货币供应再紧下去,就会使保8%落空时,才从7月开始突然大幅度增加货币发行,不到两个月 M_0 的增长速度猛然加速到10%以上。这种“减息”和“紧货币发行”的反向操作,不仅抵消了减息的作用,出现所谓“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而且可能会大调整推动经济大震荡。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当,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我讲上面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灵活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在政策操作中,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贯彻微调的思想十分重要。读者手头这本书,就是试图将我的微调理论观点作一个系统的分析和概括,为政府的政策操作提供一个指导思想框架。

本书涉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总供求关系,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就业和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财政、金融、信贷和货币政策,外贸与资本的国际流动等。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都紧扣“微调”这个主题。有的部分讨论实行微调政策的微观基础及其变化,有的部分直接讨论微调政策的构架,就微调操作的方式和技巧进行原理描述和案例解析。书中,对财政、货币政策之间,财政政策各工具之间及货币政策各工具之间的协调、搭配,政策组合模式的多样性选择,以及如何随着周期的阶段性变化改变政策的松紧度,对“松”、“紧”和“中性”三个基本的政策组合类型如何选择,如何适宜地根据经济景气度变化调整政策路径,如何恰当地确定政策操作的节奏、频率、时间和力度,以及如何调整企

业和居民的预期等,都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读者可以对这些描述给予更多的留意。

为了使我的微调理论体系既比较完善,又让读者感到对最新经济现实有新的认识和理解,在现象描述、趋势判断、行为分析和结论概括等方面,力求有所创新,有令人信服发现和推进。但是,这些创新和发现,难免简单、粗糙。在资料方面,本书尽可能采集最新数据,由于最终完稿时间是1998年11月,所以,所用数据基本上到1998年9月为止。

本来,阐述我的微调理论的书,应当由我一个人来完成。但是,由于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第二辑10本书是一个整体,单本书交稿时间不能太迟,加上我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时间紧迫,成稿中又多次患感冒和高血压,我只好请我的几个博士研究生帮忙就有关章节收集资料 and 写出初稿。参与本书有关章节初稿写作的人员有:李建伟博士(第一章)、徐强博士(第二、五章)、陶晓龙博士和张文勇博士(第三章)、高莉博士(第四章)、李春琦博士(第七章)、王冬梅博士(第八章)和刘建平博士(第九章),我除了完成第六、十章外,对以上各章作了细致的删改。但是,不管怎样,我非常感谢我的这几位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很难按期交稿,也不可能在1998年如期出版。不过,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的责任应当主要由我来承担。这不仅是因为全书的写作思路和章节体系由我提出,而且除我个人单独完成的章节外,由我的学生完成的有关章节的数据、图表、表达和观点等,我都作了统一修改。因此,本书的理论贡献不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责任应当首先由我来负。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博士对本书作出的直接贡献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锋先生为书稿的打印付出了辛

劳,让我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我也要向刘国光教授、张卓元教授、戴园晨教授表示谢忱,因为他们在 1987 年“3·5·8 改革思路”中提出和讨论了本书微调理论的若干观点。在结束本“前言”之前,我想特别提到我的女儿陈宁,她对本书的贡献,不仅包括扫描资料,在电脑上作文字编辑、画图表,而且还提供了思想观点上的启示。比如,书中“惯性”一词的定义,就是她根据所学到的物理学知识给我提供的。让我通过这个“前言”,向正在上初二的女儿陈宁表示感谢。我因此也想到,一个发明,一个创造,一篇文章,一本书,即使只是写上一个人的名字,也决不意味着贡献属于一个人,它们是许许多多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结果。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情形更是如此。本书亦不例外。

陈东琪

1998 年 11 月 15 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结构性需求不足及其特征和成因	1
	从全面短缺走向需求不足	3
	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和成因	11
	公共物品的短缺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19
	总供求关系的周期性变化趋势	24

第二章	失业的必然性与反周期性失业政策	2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失业的必然性、	
	类型和新充分就业政策	27
	实际失业率和新充分就业政策的目标	
	选择	35

	自然失业率及西方最新失业趋势的启示	39
	失业压力的来源和失业率警戒线	47
	政府的责任和反周期性失业政策	51
第三章	收入形成和增长趋势	56
	居民收入来源	57
	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64
	收入差别与其效应	68
	收入增长趋势	73
	收入政策	79
第四章	居民的消费与储蓄行为	88
	从温饱到小康	89
	收入差距扩大与消费行为的变化	9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的储蓄	98
	利率变化对储蓄、消费和投资的一般影响	105
	通货紧缩过程中利率效应的变化	109
第五章	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行为	114
	产权多元化与企业竞争	115
	企业间一般竞争的发展	119
	从政府垄断到公司垄断	12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 及其下降趋势	134
---------------------------	-----

第六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互换位 及其宏观调控	141
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最新争论	142
我们面对的现实	147
通货紧缩的正负效应	154
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反通货紧缩政策的 交替使用	157
新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	161

第七章

金融创新、信用与货币政策	166
金融创新	167
信用创新	178
信用调节	184
货币失衡和货币政策改革	188
在新金融背景下,中央银行如何稳定 经济	193

第八章

熨平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	200
“大萧条”和“新政”以及与我们面对的	

现实的比较	202
新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目标选择	207
财政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和合理搭配	212

第九章

加速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本、外贸 及其政策选择	224
资本的国际流动与外商直接投资	225
对外贸易	231
利用进出口调节国内市场	241
汇率	245
如何减少地区危机对经济的冲击	254

4

微
调
论

第十章

宏观调控中的政策操作、 微调方式和预期	268
对近两年多来政策操作的评价	269
减息效果不明显的政策和制度解释	275
市场运行存在惯性,宏观调控要有预期	286
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操作技巧	288

目
录

参考文献	297
------	-----

第一章

结构性需求不足及其 特征和成因

以消费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政策,是一项于国于民皆有益的政策,只要不是从静态的“馅饼分配”出发,而是从动态的“将馅饼做大一些”的增长观念出发,这一政策就是十分有效的。

时代变化之快,令人惊讶。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大陆经济供给不足,吃饭用粮票,穿衣要布票,人们的衣食住行非常简单。城乡家庭不仅基本上没有私人的冰箱、空调、电视、电话,而且人均粮食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人均食糖只有现在的二分之一,人均肉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人均禽蛋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男士没有西装,女士没有化妆的消费,更谈不上私人轿车、寻呼机、手机、电脑、传真等现代信息消费品,谈不上个人花钱去游“苏杭”和“新马泰”。那时,工厂生产什么,市场上有什么,消费者就要什么,没有“卖不出去”一说,工厂只有“采购员”,不需要“推销员”,因为“短缺”是一种普遍的

现象。在这种短缺背景下,居民消费旺盛,工厂投资饥渴,好像全社会存在一种永远也不能满足的需求压力。所以,那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通过压低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缩小供求缺口;是如何控制需求的增长,抑制经济过热和因需求过旺引起的通货膨胀;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进行定量配给,让每一个人都能维持仅仅只是停留于生存的生活。所幸的是,那时人们有一种现在看来也无可指责、不怕生活苦的乌托邦精神境界,人们奢望不高,比较满足于现状。社会沉浸在一个低生活水平、低物质追求的状态。

经过 20 年的改革,到 1998 年,一切都变了。过去,老百姓买好一点的東西,要凭票,要搞关系、走后门。现在,市场上东西富足,企业生产的东西发愁卖不出去,卖家广告满天飞,降价、打折、“买一送一”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学讨论、企业和政府决策会上,以前研究的主题是如何应对短缺、控制通货膨胀,今天却变成了如何应对需求不足、控制通货紧缩。中国经济“走出短缺”,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这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在经济学上,提到“有效需求不足”时,很容易联想到 1929—1933 年西方“大萧条”的情形,很容易联想到 1936 年凯恩斯在他的名著《通论》中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主张。现在要问的是,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同 20 世纪之初在西方开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有什么异同?我们如何根据这些异同,来制定更为有效的新经济政策?在政府的政策操作上,应当采取何种干预方式才能更为有效?这是本书各章要设计的问题。本章主要从“理清经济背景”的角度,集中讨论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成因、特征和一般政策指导

的原则,为以后有关章节提供一个理论分析的铺垫。

一、从全面短缺走向需求不足

1. 改革以前的全面短缺与积累和消费关系处理失误

1978年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者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均由政府部门的统一计划决定,生产过程的投资品和消费过程的消费品实行定量分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经济中普遍存在短缺,供不应求,人们的有效需求大大超过有效供给。为了尽快摆脱这种短缺现象,上上下下急于求成,决策中表现出强烈的赶超冒进情绪,国民收入总量的分配受“高积累、低消费”指导思想的支配,发展战略受“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教条的影响,社会资本积累投向偏重于工业和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所有这些做法,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它们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反而使国民经济过度重工业化,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宏观效率低下,有效供给形成缓慢并且不能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最终使经济生活中的“全面短缺”程度愈来愈高。

通过对改革以前的经济决策行为进行总结,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偏差,是对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处理上过分“重积累、轻消费”,经济决策的起点不是放在居民的最终消费上,而是“为生产而生产”,当时以为只要有生产就会有消费,供给可以自动地创造出需求,政府决策明显地受“萨伊定律”的影响。下面,我们来看各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怎样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

“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9%,农、轻、重以及能源、运输邮电业的投资比例比较合理,消费率和积累率分别为75.8%和24.2%,作为最终消费的居民消费占总消费份额在90%以上,年均消费增长达到6.5%。这期间,明显重视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重视消费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但是,到了“二五”期间,经济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求快心理,实行“大跃进”和“赶超”战略,从1958年起,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大幅度提高积累率、降低消费份额。1958年,消费率下降为66.1%,1959年和1960年,又进一步下调为56.2%和60.4%,同时,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和39.4%,这期间的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而且,资本配置偏向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36.2%提高到54%。加上“天灾”和“人祸”双重因素的影响,国民收入出现了年均负增长3.1%的严重局面。在三年调整中,为了维持国民的生存,政府不得不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期间消费率提高到77.3%,积累率下降为22.7%,消费与积累的平均比率恢复到略高于“一五”期间水平的3.41%,消费年均增长11%,资本配置中加大了农业投入的比重、降低了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这种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生产和结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几年中,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7%。“三五”期间,消费率又下调、积累率上升,消费年均增长率下降为5%;在投资的产业结构上,重工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国民收入虽然达到了年均8.3%的增长率水平,但是,居民消费水平未见明显提高。“四五”、“五五”期间消费率进一步下调,分别为67%和66.8%,积累率上升为33%和33.2%,投资中,轻工业比重提高,重工业比重下降,生产和消费的结构矛盾不很突